考古人類學刊・第 83 期・頁 75-88・2015
DOI:10.6152/jaa.2015.12.0005

「群眾」和「黨」：
中國革命話語進入佔領運動論述

陳 浩 乾*

摘 要

項飈在〈直面香港：群眾運動中的民主訴求與政黨政治〉一文中嘗試統整性地思考雨傘運動、香港治理危機、一國兩制和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關係，並在分析中貫徹了對「群眾」與「政黨政治」的認識，以理解發生於香港的佔領運動與中國政治格局之創新可能的聯繫。然而，他對雨傘運動、香港政治生態以及香港社會的經驗性事實的掌握不足，加上圍繞 89 運動和黨的領導權變遷的敘事企圖，以致未能意識到中國革命歷史與革命話語籠罩下對「群眾」的理解和想像，與現實香港佔領運動與運動的參與者有諸多差異。本文將圍繞這一差異，對文章的觀點和理論設想，提出若干批評和反思。

關鍵字：香港、雨傘運動、中國共產黨、群眾、政黨政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 83 : 75-88 • 2015

“The Masses” and the “Party” : Can We Theorize the Occupy Movement through China’s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Haoqian Chen *

ABSTRACT

In his article “Understanding Hong Kong: Democracy and Party Politics in Popular Movements,” Xiang Biao considers the overal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mbrella Movement, the governance crisis in Hong Kong,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pproach, 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uses the theory of “the masses” and “party politics” from China’s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to understand why the movement happened in Hong Kong and what possible innovations it could bring to China’s politics. This essay argues that, however, Xiang’s attempt rendered his analysis too PRC-centric, for instance he heavily draws on the experiences of the 1989 Tian’anmen Movement in pred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and takes changes in CCP as the central cause of various developments. As a result, he fails to recognize that his appropriation of the notion of “the masses” in China’s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s removed from the Hong Kong reality. I will focus on these differences and put forward some critiques and reflections on his article’s basic ideas.

Keywords: Hong Kong, Umbrella Movemen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ss, party politic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M.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unghai University

前　言

項飚的〈直面香港：群眾運動中的民主訴求與政黨政治〉（以下簡稱〈群〉），以及隨後的訪談〈項飚：中國人像蜂鳥，振動翅膀懸在空中〉（郭玉潔 2014），集中了他對中國大陸與受大陸影響下的香港近期情況的焦慮、分析和判斷。這在今天似乎日趨緊張、自負的中國黨國體制思想管制的狀況下，是珍貴的思考嘗試，兩篇文章于網路先行刊出後，也收穫了許多人的重視。大致上，前文集中探討了發生在香港的佔領運動，如何可能轉變為推動香港本地政制改革、社會進步以及中國政治格局創新的歷史契機。後文通過訪談的形式，概述了個人研究經歷，對當前中國問題的觀察，以及對於在當前條件下推動社會進步的政治判斷。這兩篇文章中均貫徹了，同時也是引起許多爭議的核心觀點，即改造、復興「傳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作為一條解決當前中國社會問題的政治行動路線。這一判斷，與他對當下中國面臨的一系列糾結難解的問題，例如黨國關係、過度市場化、普遍的思想虛無、民眾對「社會」的不信任、世界格局的變遷等狀況的擔憂、理解緊密關聯。不過，項飚在這兩篇文章中，並沒有圍繞著這一點來論述，而是將之作為支撐思考展開的前提、出路和基本判斷。或許也由於這個緣故，儘管以「群眾運動」為名，但項飚似乎未將群眾運動視為一個有望改造、影響當下中國的選項，而是表現出矛盾的態度，一方面希冀於群眾運動提出「挑戰」，另一方面又擔心未加深化的、以政治行動為目的的群眾運動會掩蓋「真問題」，並可能在歷史的錯綜關係中導向原本不預期的結果。

> 香港今天的情況當然不一樣，但是我們應該問類似的問題：究竟應該怎麼分析香港的金融和地產資本的地位？挑戰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在現實中究竟有哪些具體的撬動點和撬動器？香港和大陸、亞洲、世界的關係面臨著歷史性的變化，究竟該怎麼理解和應對這一趨勢？普選方案本身不能回答這些問題。相反，如果過於關注形式化政治民主的問題，可能讓這些真問題被隱藏起來。當運動過去，不管政制形式如何變化，既得利益的核心群體可能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有可能變本加厲。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可能只為以新面目出現的保守勢力提供合法性。

這裏透露出項飚的核心關切，在社會關係的內部是縱向的經濟結構不合理、貧富與機會差距不斷擴大，在社會關係的外部是橫向的香港、大陸、亞洲和世界關係的劇烈板塊變動，而這兩個軸線相互交錯形成的秩序結構，並不能為在香港本地社會中的爭取「真

臺灣東亞學術期刊資料庫

普選」運動，和「形式化的政治民主」所解決。這一佔領的「現場」恐怕不能挑戰其須針對的「結構」對象的憂慮，也將在香港發生的「雨傘運動」，與年初發生在臺灣的「太陽花運動」，以及 08 年以來，世界範圍內的各個佔領現場聯繫起來。該如何將此種既植根於在地社會的獨特歷史脈絡、政治訴求，又仿佛在全球意義上連結為世界共景的佔領行動，與中國大陸社會對佔領（廣場）行動的歷史理解連結起來呢？這種連結又會對在香港社會，以及中國大陸社會內思考、面對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提供何種啟示？

本文旨在分享出生成長於大陸，又在台求學數年的陸生主體視角對這兩篇文章的閱讀體會，並嘗試也循著相近的理解路徑思考，對基本放棄黨外政治活動設想，伴隨中國崛起和經濟實力爆漲的歷史經歷的中國大陸普通人，以及主要由他們組成的中國大陸社會而言，2014 年發生於華文社會內的兩次群眾運動，對其理解自身歷史發展軌跡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以及仿佛必須預設黨之存在的此時空和港臺社會的彼時空的關係，已產生和可能產生的影響。在〈群〉文中提出的若干問題、觀點上，提出幾點反思和批評。另外，我也要說明我寫作本文的過程並不容易，由於這一點和〈群〉文的主旨有著密切的關聯，或許也有助於港臺讀者進一步理解項飚的黨國敘述有深厚的歷史原因，我將在文末補充同樣基於黨國生命背景的試探性提問，以進一步拓展對話空間。

「運動化」分析的虛實預設

項飚在文中總結，香港社會在近十年經歷了不同尋常的政治化和運動化過程，雨傘運動是這一整個複雜過程的總匯合和總爆發。然而此種匯合與爆發，由於要形成能調動多方情緒的抗爭性效果，運動化本身可能反而虛弱了此前具體多元的社會運動的基礎。這一運動化分析，要結合〈群〉文的整體結構來理解。〈群〉文前半部分討論了佔鐘／中的差異，並進一步分析群眾運動的「運動化」，受制于香港社會於「外向性」脈絡下成型的尋求民主、自治權的政治話語，後半部分則主要討論了一國兩制與黨的領導權的關係。支撐前半部分分析的一個核心考慮是「虛」與「實」的差別。虛是指，群眾運動調動的情緒雜糅並起，可能缺乏對香港社會當前民主格局和未來命運的實質思考的特點，這是它能夠從社會中汲取巨大能量的一面。實是指，訴求民主與自治權的政治話語，「指向中央政府」，有著明確的抗爭對象。項飚認為，西方媒體、香港反對派、港府和中國大陸的媒體，出於各自的原因，都未對佔中／鐘加以區分，進而也就將模糊的情緒和有具體所指的政治訴求進一步聯繫起來。這會使得在港中關係的長期歷史過程中前後

臺灣考古學術期刊資料庫

疊加，又不斷浮現的問題，落到無法解決，也註定衝突性的「僵局」之中。這種僵局是狹隘的地方主義、保守力量的復興，是既存社會結構性問題的強化，也可以是港中關係的進一步對立化。

同樣的視角也出現在了對 89 運動的分析援引中：

> 1980 年代後期中國民眾對通貨膨脹的恐懼，對於官倒腐敗的痛恨，以及對驟然加劇的社會不平等的不知所措，都被表達為對政治民主的追求。參與運動的學生人人以為，一旦民主之光照臨，一切問題將迎刃而解。人們基於社會主義正義、平等的觀念對當時強權下的市場化的質疑，在運動中則被表達為進一步擺脫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

項飈推斷群眾運動，恐較難脫離其虛實連結的兩面，一方面它與社會的深層次問題是一種虛的，情感的連結，有時似乎無力分析、反省，另一方面它又與（特別是反對較不民主政體的）民主話語、民主政治的「實」的訴求相連，實際在上述兩個例子中，都是指部分或全部地反對黨的領導，因而隨著運動的開展，其與中央政府之間的協商空間就會變小。「虛—實」的特徵，仿佛必然左決了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群眾運動的發展方向和命運，既有它的高潮與激情，也極大可能走向覆滅與不預期後果。葉蔭聰（2015）已經指出，此種對運動的分析，由於對黨的角色的巨大忽視，怪異地將 90 年代後中國大陸出現的新自由主義化的諸多狀況，置為群眾運動的後果。而項飈卻認為這是大陸的歷史經驗對當下香港政改可能具有的參考價值。這個類比有其真實且確須審慎面對的一面，即群眾運動的發生會遭致中國共產黨的懲罰性決策，或更進一步地促使它依賴於近來的治理手段和治理慣性。從事實上看，由雨傘運動而承受的暴力不僅確實已發生在香港，也已經發生於中國大陸。然而也因為有著此種歷史走向的粗略設想，〈群〉文忽視了雨傘運動與 89 學運所處的社會政經背景的巨大不同。此處出現的對經驗事實的理解局限（同時可能也是大多數中國大陸普通人難以理解雨傘運動的原因之一），是本來試圖要連結中國大陸和香港兩地社會的〈群〉文，應該嘗試克服的。對於新時代下佔領運動的具體作用形態，其起始資源、組織方式、發展、內部的多元訴求、走向，以及佔領運動的參與現場和本地社會政治生態和政治話語之間的關係，都需要更細化的理解。這也是對佔領運動持支持立場的人普遍強調的。同時，在細密的經驗事實呈現和分析描述中，中國大陸主導性的意識形態的局限，或許更有機會被凸顯。

以臺灣於同一年發生的太陽花學運為例，「虛—實」分析以及貫穿而至的對「運動化」的悲觀預期，在台灣社會或許並不佔多數。觀察正在發生中的運動固然一定會有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漸趨模糊於社會實體與日常經驗中的面向，這既是對觀察的挑戰，也是運動本身的特性。社會的諸種情感、對自我的理解，與發生中的佔領運動之間有既充滿表面動勢、又飽含深層潛流的連結，或許在發生的當下形成了一致的方向，卻也往往預留出許多岔路。太陽花學運引發的討論和意見十分多元，運動既未簡單順從於既存政黨勢力的政治話語（如台獨與本土化），且也未導向和政府的徹底決裂，社會問題由此更加無法得到細緻分析的後果。就「虛」包含的一個基本判斷，學生衝擊並創造出佔領現場而言，也不見得是偶然的，而實際上是各種組織化理念與設想長期實作的結果，這究竟屬於「群眾運動」還是屬於「政黨政治」呢？另外，〈群〉文對情感、情緒的擔憂，和佔領運動參與者，以及不少觀察者、研究者對情感、情緒價值的積極發現、理解之間，在認識上也有不小的距離，似乎需要進一步解釋其「虛」的視角，和運動參與者的自我體認之間的差異。

於雨傘運動和 89 學運之外，〈群〉文僅提及「阿拉伯之春」，也是在同一敍事框架下的描述：

> 如果運動的具體要求都得到滿足，但是基本的經濟社會關係沒有改變，那麼這可能就是失敗的運動。「阿拉伯之春」就是一個眼前的例子。

並在註腳中進一步說明：

> ……阿拉伯之春演變成為「阿拉伯之冬」。雖然群眾運動迅速地顛覆長期執政的獨裁政府，但是沒有真正深入農村、深入工農，沒有形成有效民主建設。革命後的國家或者被原教旨式的宗教勢力把持，或者被軍人掌控，或者陷入內戰。

即使存在著一種一致、正確、普世皆然的革命方法論（「深入農村、深入工農」等），〈群〉文中引述的「阿拉伯之春」畢竟是在推翻了「獨裁政府」後發生諸多複雜結果，也不能與 89 學運及之後的中國大陸社會狀況，簡單地相互佐證並歸於同一種因果關係。然而，項飈有意識地將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與群眾運動理論對香港佔領運動加以投影，也許給了發生在此刻香港的佔領運動一個歷史更長、地理更寬的時空軸線和政治期許，這與簡單強調當前香港社會面對的中國因素有很大的差別。與主要聚焦於當前運動和社會變遷可能的佔領運動理論相比，項飈所述似近實遠，可能並非一件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對話的中國位置

上述在群眾運動的名目下並置性地理解 89 學運和雨傘運動，且在時間序列上呈現為一先一後，一已有後果，一尚去向不明的努力，可能包含了項飆及其一代生逢 89 學運，並或遠或近地參與期間的中國大陸學人將 89 學運設定為華人社會的民主運動、群眾運動起源神話的生命情節。而其背後隱現的大陸中華正統觀，及與此種正統觀相互連接的與黨的親疏遠近的關係視角，在項飆的分析中既高度影響了對雨傘運動走向發展的判斷，也整體性地妨礙了他對香港社會諸種特質的發生、發展歷史，及佔領運動歷史處境的更複雜觀看的欲望。儘管〈群〉文曾提醒，政治人格和尊嚴的問題是引發對立情緒的重要原因：

> 讓香港一人一票選擇事先控制好的候選人，這意味著對香港選民的政治人格和尊嚴的蔑視，還不如不普選。一個大學生問我：「憑什麼把你自己想講的話硬塞到我們的嘴裏？」

然而，項飆在將香港的民主化置放在現代中國的歷史運動過程（如中國先孤立又重新加入世界市場體系）下時，似乎又罔顧了上述他本已經注意到的問題，流露出大陸中心的粗礪一面。若這一被抽象的理念設想緊緊束縛住的「香港」，其不在「中國」之下的歷史和社會特質，被政治上敵視，或從認識上剔除，那中國或真誠渴望的文明進步便更加不可能到來。也由於這個緣故，項飆在文章開頭提及的易被運動化和事件化掩蓋的香港社會內部的多元和差異，反而在他自己的分析中被中國的歷史運動弱化、邊緣化了。這也不符合項飆原本想借香港問題提出中國當前政治困局的目的。

在將香港追尋民主和自治的政治訴求獨立出來，放置在外向性的理解脈絡下之後，〈群〉文越來越難以進入香港社會發生著的群眾運動，長期以來政治訴求的發展變化，及其社會內部在多重歷史力量交織之下形成的特殊社會文化。也由於缺乏對佔領運動發生所處的歷史時空的複雜經驗與可能走向的掌握，原本作為現象的粗略描摹（同時包含了敍事企圖）的「外向性」和「運動化」概念變得越來越重要，也越來越真實。〈群〉文的這種前後不一，也表現為行文中三段跳躍式的不同知識取向的區別。在呈現佔中／鐘區別時，仍有意經驗地指出雨傘運動應與（不論對參與者還是旁觀者）香港社會內部的複雜性及其歷史成因相聯繫，然而在討論民主和自治權的政治話語的歷史與現實時，這一原本可發揮處，卻顯得不足，而主要是宏大歷史關係的概括式塗抹。

與其說香港的群眾運動要警惕其「外向性」傾向，繼而會出現對立的僵局，不如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國大陸要警惕放置香港於不內不外的位置，並不自覺地既要求其具「外向性」——要服從中國的整體安排，又要求其不要「外向性」，不要出現港獨思潮，不要對西藏、新疆說三道四。這種思想上的「委託式管治」，可能比行政運作上的「委託式管治」更加造成今天香港的尷尬處境。依循同樣的「委託式」設想，在個體日常生活實作中，原本具有豐富意涵的「港」、「中」有別，就成了思想自律的對象。文中已經提到的一些民族志材料中，「外向性」概念（及如何克服之）何以能夠更好（相較於「排外的地方主義」）地引向深入的社會分析，也未詳細說明，這樣或許更使人覺得所謂民主訴求需要「克服外向性」，與香港面對其社會問題並無直接聯繫，而只是「中國」的要求。

在〈群〉文中，項飆或可更警惕其作為研究者在國族認同上的位置與研究對象的自我身份認同，於認知、情感、作為公民主體的倫理實作等各方面的異同與衝突，可能需要進一步被放置於更寬廣、更具體的國族不／主體化的歷史脈絡中對話，從而有意識地創造出更寬廣的對話空間。這也彰顯了研究者的個人經歷和其觀察、論述與研究對象在關係上的複雜性。讀者也要避免將〈群〉文中的黨與「中國」簡單化，這也是〈群〉文後半部分論述的核心。項飆特別強調通過革命和革命式執政實作中，不斷產生政治、理論、道德和情感效果的中共領導權，是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中可參考的積極因素。但是對這一領導權的描述，似乎也帶有反智化的傾向，「這是靠一個個的幹部日復一日，以身作則「做」出來的」，仿佛不盡能言說，這對進一步凸顯運動化和事件化之缺陷的分析沒有提供太大的幫助。歷史上的幹部和今日群眾運動參與者之間的關係（可以）為何呢？

殖民主義、民族國家的興起和中國革命之間既曾存在複雜的歷史關係，革命的宏大敍事也必須在當下和個人實作層面保持聯繫，這就要進一步注意國家和國族不／認同在差異的主體化經歷中的起伏變化。在過去若干年的歷史中，在中國大陸社會內部，圍繞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對革命中國、現代中國和運作中的黨國體制的不／認同關鍵地影響了個人如何敍事性認知共同分擔集體命運的周邊其他人及自身的物質情感實作，項飆（以及我）並不特殊。通過項飆過往的文章，可以清楚看到這一痕跡：

> 我雖然成長在「文化大革命」之後，但是在成長過程中，國內媒體對國際新聞的報導依然極其有限，分析和評論基本不存在。媒體對國內的報導也是日復一日用同樣的話語，信息量少，更談不上分析性或者批判性了。我是到了英國之後，掙紮著看點報紙和電視，才第一次體會到實證信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息的力量體會到調查、分析、辯論、反思不是為了學術而學術的工具，而是民主社會裏大眾的自然要求。（項飈 2012[2007]：35）
>
> 大量的西方理論著作被翻譯成中文——不少翻譯生吞活剝，無法卒讀。（比如我自己發現的一個令人吃驚又叫人捧腹的例子是，哈貝馬斯的一本書中的「後現代主義」被譯成了「郵政現代主義」！）但是對於像我這樣的年輕學生，對理論和貌似理論的說法似懂非懂，反而更覺得神秘莫測，妙不可言。因此，到牛津讀博士在當時也不算是件小事，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們把它看成是孫悟空去西天取經——要去尋求人類學的「真經」。（項飈 2012[2007]：37）

以上片段的引用，是想說明「中國」曾不斷地影響了項飈的學術生涯，讓其變得更想掌握「實證信息」，或更追求「理論」，香港要在中國之下克服其外向性，也來源於相似的文化邏輯，項飈在文中也嘗試有意識地表現出這一點。以下，我以個人赴台求學的經歷說明相較項飈，我的個人經歷與「中國」身份相互連接時的特殊性，藉以說明何以能夠意識到〈群〉文中的一些我認為有欠考慮處，並進一步說明我對〈群〉文「中國」傾向批評的具體含義。

首先，在台求學期間，我既在各方面與臺灣師生或普通人發展出親密性，也由衷感到他們面對降臨中的中國黨國體制的切身焦慮，這是我原先從資訊上無從重視（如，我至台後方知曉的「飛彈危機」），也在心理上無法設想的，這使得宏大敘事的話語如「和平統一」、「台獨」落實到具體的生命經驗中。對於大多數中國大陸普通人而言，其對臺灣社會觀念與情感結構的瞭解還很有限，反之臺灣年輕人對於中國大陸似乎也不知該從何瞭解，往往也缺乏瞭解的興趣，此種彼此「盲視」的狀況，也使得「一國兩制」所能包含的實質內容顯得十分空泛，其中的「一」和「兩」是非常消極、有限意義上的。另外，在宏大敘事的層面中，非此即彼的差異似乎尤為重要，然而真實的互動過程中，恐怕並非借由語言來甄選。很多時候，語言呈現出來的衝突，恰恰體現著情感上的親密或者進一步親密的可能。易言之，只有對語言的使用有著相當的彈性，深入瞭解和情感共鳴才有可能實現。

其次，也可能是勿需在台長久生活亦能夠發現的是，臺灣社會普遍對於生命價值和多元訴求的重視，與大陸黨國體制的暴力性治理造成的「單一化」、以及諸多社會問題之間，確有較大區別。易言之，從臺灣的視角出發，其焦慮和恐懼都非常真實，「中國」與「革命」既無從撫慰這種恐懼，也完全會造成相反的結果。進一步地，我也從這種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異中，獲得了反思過往被「管」、被不斷治理狀況的觀念與經驗資源。如果中國黨國體制在 90 年代後，是依靠諸種市場化手段才得以延續，參與此種金錢治理的個體，儘管短期內或能夠用經濟話語或提倡個人競逐的道德觀念自我說服，但長此以往必將意識到自己付出的巨大生命代價，並且感到此種治理方式限制之下生命價值的虛幻性。這一點非常明顯地體現於，大陸年輕人或大陸學生，相較於臺灣同齡人，特具的激昂狀態。大陸和臺灣兩相對照，很難想像這種激昂狀態能夠在未來長久持續，現行治理慣性下的黨國體制可能是很不穩定的。

最後，相對曲折的，也許又對我的觀點形成非常重要的是，我在台求學的過程中，由於臺灣社會對中國的恐懼和焦慮，對我（以及我所代表的「中國」）採取的諸種區隔措施，引發的諸種誤會，使我能夠從交互主體的位置跨越式地理解並感受到，國族認同的形塑過程對於個人的暴力性。首先，入台政策起初規定陸生在台沒有工作權，作為研究生我無法在求學過程中擔當教學助理、研究助理；其次，在台被明確指認為「外國人」，「你們中國」，這在過去的中國想像中，我既無法去認同，又很難去否認；最後，除了陸生之外，在台相識並時有交流的同胞就是陸配（大陸配偶或大陸新娘），陸配在臺灣具有明確的次一等階層的意涵。上述經歷只是一些較能夠凸顯的片段，以說明我在個人實作層面何以無法「如常」參與臺灣社會的日常生活，何以曾感到強烈的被剝奪感，因而影響到我的自我認同和生活能力。借此，我亦能夠開始同情性地想像理解「中國」之下，對於香港社會的具體意涵。

也因上述經歷，我一方面認識到了中國的第二種可能，即它在得不到社會各種建制化支援時，也能夠成為人與人之間情感聯繫，發展出親密性的紐帶，也由此逐漸能夠想像香港或臺灣主體性的價值，以及這一價值在歷史地形成過程中，不能為中國所替代。另一方面也切身感到國族認同在借我／敵分別以自我形塑的過程中，對個體施加極度暴力的一面，這一點表現在不／「中國」框架下的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時，造成了極為複雜的彼此交錯的暴力狀況。我認為，對這些具體生命經驗的理論化、知識化的嘗試，有助於破除仿佛不言自明的附著於「中國」之上的霸權言說，不至於忽視在港臺社會中已發展出的「中國」因素的複雜性，也能進一步地使類似話題在中國大陸不至於流入或「對立」或失語的狀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群眾運動和佔領運動的理解分歧

如前述分析，香港的佔領運動在〈群〉文的整體思考架構中，並非最重要，在項飚的思考中，更為關鍵的是，群眾和黨的關係。這種關係一時如歷史明燈般柔美，一時又諱莫如深般幽暗。此處的群眾，多少也是在黨的革命歷史、革命話語中產生浮現的群眾，在對外涵蓋香港的治理危機時，其間異質性沒有得到充分注意。但與此同時，項文也提出了今時今日兩岸三地社會（包括中國共產黨自己）對於黨的陌生感。這裏涉及到項飚更傾向於使用的群眾運動和佔領運動在名稱，及由名稱指向的不同經驗、觀念資源參考體系間的差異，也涉及到如何想像理解晚近以來全球範圍內浮現的佔領運動和一個世紀之前同樣也是全球範圍內以反對支配性的秩序結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為目標的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關係，思考這一關係可能對理解當下世界的深層矛盾及其未來的可能走向有重要幫助。

佔領運動在癱瘓城市基礎設施，引發本地社會、互聯網社區、國際傳媒的持續矚目上，最能夠凸顯其視覺性上的近似。例如，黑夜之中，城市高樓之間，擁擠著的人群用手中的手機螢幕或閃光燈揮舞出的光的海洋；或者是整裝待發的防爆警察，用警棍、催淚彈驅離人群的場景。但是，佔領運動的具體參與者所抱持的行動理念、觀念結構和情感潛能，以及何以借此通過佔領現場能夠創造出不確定性以及屬什麼類型的不確定性，又緊密連接於在地社會既有的政治、經濟、宗教、公民團體等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及諸多主體化機制所設定的事件走向、個體差異社會條件下的不同經濟命運等諸種確定性。易言之，這些佔領運動面對的具體社會情境、國際關係、社會發展的時機之間有極大的差別。自蘇聯解體之後的若干年中，世界範圍內各種形式的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和衝突加劇之後的軍事行動均未間斷，何以近幾年，創造出各種「現場」的嘗試特別在傳媒（尤其是具世界影響力的西方媒體）中呈現為佔領運動呢？其發生在已經「民主」了的政體，和普遍被認為是獨裁的政體中，又有何種區別？這一全球化概念的出現，對在地社會面對已經發生、正在發生、可能發生的佔領運動的意義為何，又該如何橫向地與近年來的恐怖主義與宗教爭端，全球金融危機的出現和蔓延做比較呢？將其和中國的革命傳統相聯接，在今天「中國崛起」下，又意味著什麼？〈群〉文籠統地處理了這一重要背景，涉及處大致僅包括：

> 西方媒體不區分佔中和佔鐘，因為它們把這些運動都籠統地理解為「爭取民主」和「抗議北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及前述已經引用的「阿拉伯之春」。 缺少詳細的對話，未能進一步理清〈群〉文的理論貢獻，文中的分析有些來回擺蕩。忽而全球化了，世界版圖的變遷似乎對香港命運尤其重要，而阿拉伯社會、今日香港和 89 年的大陸皆可一併來談，忽而又「中國」特殊了，尤處在革命籠罩下的 89 學運成了支配性的典範。若要進一步說明前述「運動化」的擔憂，項飚也許需要反思其「群眾一政黨」的區分，在當前香港和大陸社會中的意涵與中國近代革命史中的異同，才能進一步理解在香港發生的佔領運動和中國革命的意識形態理念與實作的關係。我想這也是〈群〉文試圖實現的目標之一。否則，文中的「群眾」似乎僅意味著等待加入或被利用為政黨競爭的工具。

以港臺社會為例，「雨傘運動」和「太陽花運動」，大體上均聚焦於推動有效民主（真普選和反黑箱），特別在當前時空背景下，皆從長期無力改善、扭轉社會不平等狀況的政治失能中，收穫了大範圍的動能。相同的，港臺社會也都處於全球範圍的「金融化」和資本加速流動轉移的背景下。然而對有效民主的期盼，和人們渴望獲得更多生命機遇的目的之間，尚存在當前佔領理論無法擘畫清楚的落差。至少，在地社會的民主進程和全球資本流動的關係，就不一定十分清楚。項飚在嘗試召喚中國革命理論的過程中，是基於兩個不同性質的悲觀觀察和預期，其中之一是當前黨國體制的日益官僚化、無機化，對社會發展的想像力越發單一，另一個是對民主機制（以及不斷以「民主化」特別是反對不民主的體制作為願景）能否解決全球結構性問題的疑慮，擔心在民主話語限制下的佔領運動，會淪為內耗性的、鬥爭不斷升級、思想觀念不斷極端化的溫床。所以使用「群眾運動」的其中一個意圖，或在指出仍處於「民主化」、「本土化」漩渦中的佔領運動之先天不足。可能正是革命的消解，使原本團結于革命周圍的社會能量，不斷以佔領運動的方式出現。有意排斥、無視中國黨國體制之歷史形成的港臺社會（同時也是今天的中國大陸社會），越可能陷入到這樣一種困境。

在／面對香港的「革命黨」

〈群〉文在後半部分，在對一國兩制和黨的領導權的關係討論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香港的治理危機對中國共產黨的意義為何？依照〈群〉文的分析思路，概括而言，上述問題所揭示的可能性，包括兩個部分。在理念層面上，面對一國兩制的許諾，當下的黨需要與 2-30 年前提出香港、臺灣和中國大陸關係設想的黨相連結，會否有機會使其反思治理能力、治理方式轉變後的限制與代價？在實作層面上，中國共產黨在香港

臺灣考古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位置非常特殊，在沒法以行政化、委託式管治的方式處理香港問題後，會否嘗試回到群眾路線，恢復與社會的有機聯繫，借香港重新找回其革命黨的部分特徵呢？進一步的，由於要處理香港問題，也連帶中國大陸的政體也會發生變化：

> 香港今天的運動揭示了新的挑戰，即歷史上的多次革命無法再成為合法性的自然源泉，同時政治訴求的多樣化明顯上升。這一歷史挑戰，在大陸同樣存在。香港的困局，確實提出了中共應該如何爭取對國家的領導權的問題。

然而，姑且不論香港社會會否歡迎恢復革命特質的黨，回避現實當中正在發生的黨與香港社會的關係，以及中國共產黨為了處理香港問題而做的種種在中國大陸，或在香港本地的機構設置、資源配備和制度設計，上述思考（儘管好像在觀念上是一條捷徑）最後也會淪為空想。中國共產黨近年來面臨的治理危機，絕不止香港一個，何以香港就有這種特殊性來使黨做不一樣的選擇呢？這也是嘗試說明此種路徑合理性的〈群〉文，需要進一步解釋清楚的。以現實層面的例子看，黨和佔領運動對網路的使用方式截然有別。黨的方式是使（可能）致其不悅的內容消失，併發展出成套的技術體系和管制理念。一旦消失開始作為一種方案，它似乎就會避免不了不斷放大、泛化的趨勢，越是設想資訊的傳遞會得到正面的回饋，不確定結果的資訊就會被清除。最後的結果是「黨—群眾」以往具備的彈性關係可能統統不見了，中央政府越來越像單方向的「網路真人秀」，這套現實中正在運作著的管制慣性，如何相容並納項飚的革命黨的設想呢？

項飚在〈群〉文中的分析，已經使用革命話語、革命理論對當前正在發生著的佔領運動作了一番剖析，反過來，再以佔領運動的理論來對正運作著的革命政權作一番剖析，兩相結合或許更接近探尋中國政治格局創新契機的目的。

思考中國和黨的困惑

若非要寫作，我很難面對〈群〉文涉及的一些問題，寫作過程也就十分痛苦。原因在於，我與中國以及中國革命均有很深的情感與精神聯繫。由於和〈群〉文的主旨相關，並也為凸顯對話的特徵，我覺得有必要將自己的困惑簡短附于本文末尾，主要有三點。首先，如果黨的意識形態對於香港或者臺灣社會的理解力非常有限，在此基礎上也無法產生實質性的對話，而黨在現有體制和治理環境下，又沒法翻轉或極大豐富其意識形態內容，「一國兩制」如何有可能實現或其或許必然地將以何種方式實現？可能最後以「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兩制」為名，會導致和理想化設想很不相同的結果。其次，在「中國」之下，個體對大陸社會的集體情感的延續，和對港臺社會（特別是其反對「一中」或黨的部分）的認識，彼此之間時而矛盾（港臺社會中的普通個體反過來也是如此）：因情感而不能認識，或因認識而感到背叛了情感。「中國」可能既帶來認識的焦慮，又不斷製造出認識的阻礙。最後，在當前社會狀況和世界秩序之下，人民主體和公民主體之間是否存在著深刻的不同？這種不同確否存在，以及有無可能得到彰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以何種方式彰顯，可能是黨的領導權的起落背後，更重要的問題？

引用書目

郭玉潔

2014 〈項飚：中國人像蜂鳥，振動翅膀懸在空中〉。「界面」，http://www.jiemian.com/article/215429.html，2014 年 12 月 17 日上線。

項飚

2012[2007] 《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的技術勞工》（Global “Body Shopping”: An Indian Labor System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王迪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 〈直面香港：群眾運動中的民主訴求與政黨政治〉。《考古人類學刊》83：5-24。DOI:10.6152/jaa.2015.12.0002。

葉蔭聰

2015 〈直面黨國權力：回應項飚的「雨傘運動」論述〉。《考古人類學刊》83：57-74。DOI:10.6152/jaa.2015.12.00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